

编者按：故宫博物院民国时期的出版事业，离不开当时一批先贤的努力。现在的我们可以通过档案的记载来追忆先贤们的出版事迹。

当然，档案记载有多寡详略之别，难免有所缺失，但本文对故宫出版先贤们的细致梳理，却不失为是对故宫博物院出版史的一次别样整理。仅以此，为日后志于研究故宫博物院历史之人提供参考。

# 弘扬文化之先行

## 民国故宫出版事业先贤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先贤们为了打破皇家秘藏的封闭状态，大力发展出版事业，建立了集编纂、印刷、发行一条龙

### 故宫出版的领导者们

的出版流程。他们各司其职，领导者、组织者、编辑者、印刷者、发行者合力促进了故宫博物院出版事业的进步。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的核心领导层中，对出版事业有较大影响的有陈垣、易培基和马衡等。

自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逊帝溥仪

出宫后，故宫的管理机构先后经历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临时理事会）、维持员、保管委员会、维持会、管理委员会等变迁，李煜瀛、庄蕴宽、江瀚、王士珍等主要领导者前后更替。贯穿这一时期的中坚人士是陈垣、易培基、马衡三位先生。

### 为维护合理性提供有力武器——陈垣

陈垣（一八八〇年—一九七一年），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史学家，曾任清室善后委员

张小李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清宫史与出版史

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清史善后委员会召开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当天，委员长李煜瀛因社会事务繁忙，函请陈垣担任代理委员长应兼任的常务委员职务，并随时代理委员长职务。故宫博物院成立后，陈垣先生任理事会理事、图书馆馆长，此后他便一直在院务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如一九二七年八月，北京政府拟组建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他于八月二十一日致信故宫同仁召开茶话会，商讨政府改组之议。一九二八年底易培基担任

院长后，陈垣仍旧为理事，但逐步淡出了故宫事务。

陈垣先生在故宫任事期间，故宫博物院出版事业在筚路蓝缕中起步，清室善后委员会摄影股、古物馆流传课、总务处工程课、图书馆掌故部等承担了故宫博物院出版职责。

陈垣先生将故宫的出版事业作为维护清室善后委员会合理性的有力武器。清室迁出紫禁城，接管故宫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成为守旧势力的眼中钉，而陈垣先生用出版回击守旧势力的恶意诋毁，布置宣传《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一事就证明了这一点。据那志良先生回忆，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点查人员在养心殿溥仪居所发现了一批一九二四年的清室密谋复辟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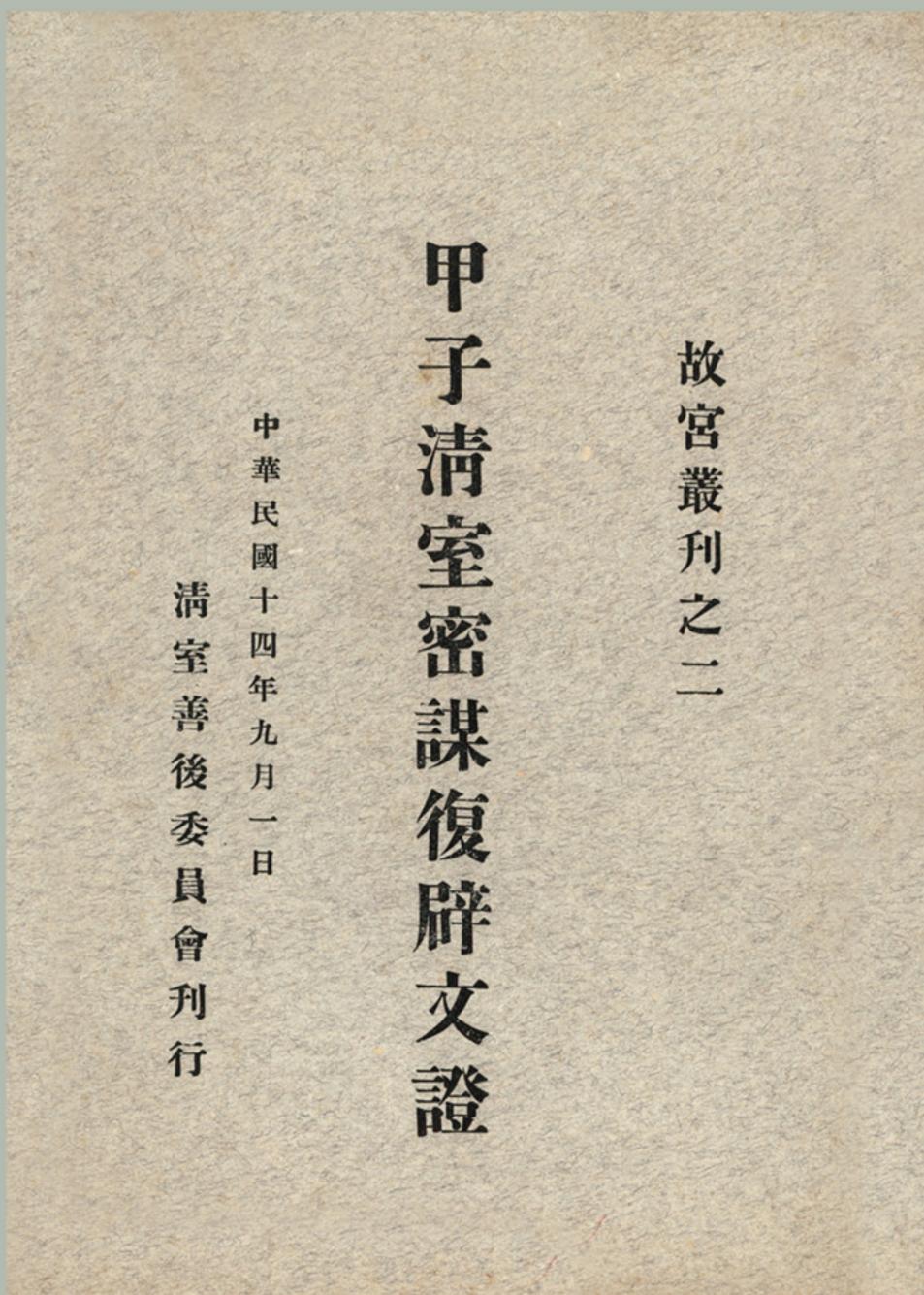
陈垣（一八八〇年—一九七一年）

文件送到陈垣先生那里后，陈先生马上布置人员分抄，后全文出版。善后委员会对此进行广泛宣传，其目的是向公众宣示：

如果不请溥仪出宫，或许又会发生复辟的事。陈垣先生力主尽快公布故宫所藏档案史料，供学界研究，他认为：「公布档案史料不必耽搁时间，搜寻某一历史时间的全部档案，根据档案原来次序发排，十天出版一册，如果原来档案不缺的话，将来总会出齐的；采用线装，可以给不同读者

根据不同需要时拆散重装。」（朱家溍《回忆陈垣、沈兼士两位先生》，《紫禁城》，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陈垣先生还为故宫出版物《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撰写了识语，并为故宫出版的论文集撰写了《记吕晚村子孙》《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等多篇论文。自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北伐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故宫博物院行政事务院长领导体制确立之时



《甲子清室密謀復辟文證》

# 故宮週刊



本館理事院長易寅邨先生小影

清木質皇帝之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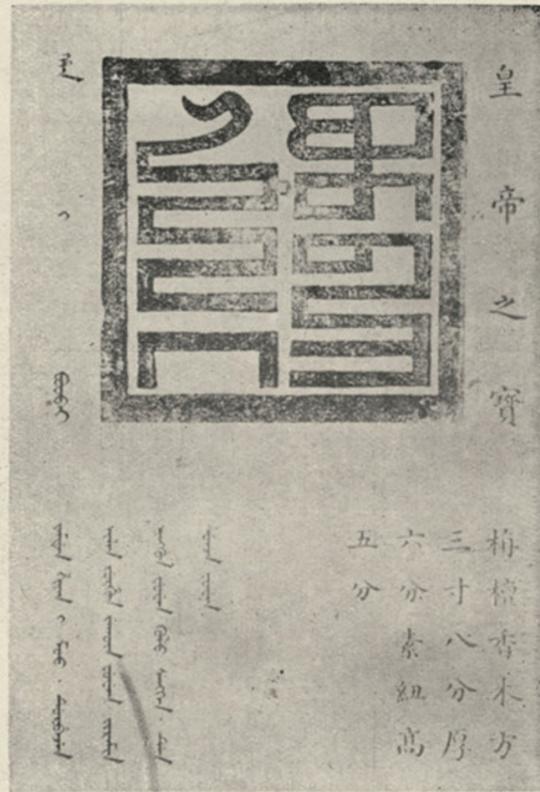


樓本三層、高宗特減其一、蓋有持盈戒滿之意也、余讀樓記、輒以自警云、

清德宗遺稿

讀寶月樓記

自瀛臺而南、有樓高聳雲霄者、曰寶月、此高宗望月之地也、登樓以觀、蒼然而青者、西山也、幽然而碧者、液池也、雲烟之變幻、魚鳥之飛潛、內而臺榭之參差、外而車馬之馳騁、遠近之景、皆聚於是樓



梅檀香木方  
三十八分厚  
六分素紐高  
五分

補桐書屋記

自涵元殿而東、繞廊數十步、北折、穿一門、有屋三楹、為補桐書屋、其南有雙桐、枯其一、純廟時命補之、因以名焉、昔高宗讀書於此、及登大位、猶追憶前事、見於吟咏、其典學之勤如此、予小子仰承先訓、俯仰庭柯、敢不朝夕惕厲、以無忘桑梓敬恭之義、

試馬記

今年八月立馬架於庭、御前大臣率侍衛等執鞭鐙以待余日一試馬、或曰此真馬歟、曰非也、非馬何以



清緯絲採蓮圖

試之歟、曰冀北之野、馬之良者多矣、豈能徧千萬馬而試之乎、不能徧千萬馬而試之、則試一馬可通於千萬馬矣、夫一馬可通於千萬馬、則非馬而類於馬者、亦可通於馬矣、天下事有不必躬親而能執簡馭繁者、皆此類也、又何必沾沾疑其非馬乎、作試馬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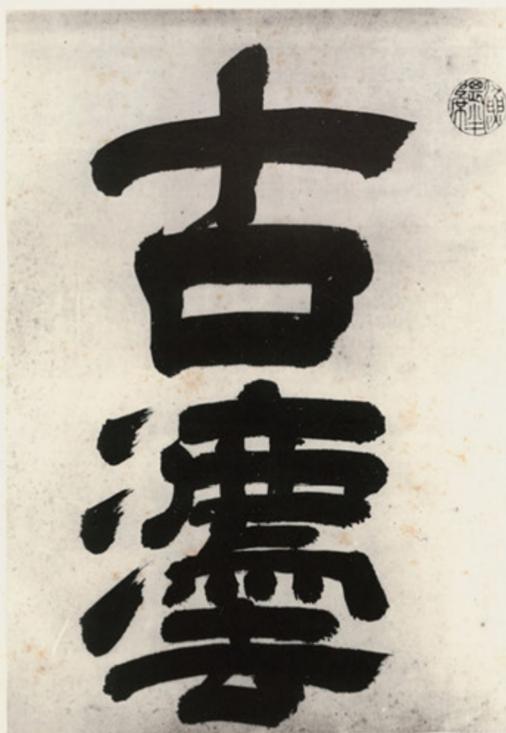
記畫蘭

余觀畫譜、得畫蘭法、於是日寫蘭一枝、似不似、不論也、蘭、嘉卉也、生於空山之中、含幽香、抱靈氣、不求之不肯自獻也、余未見蘭而漫然以寫之可乎、然正唯未見蘭而寫之更不倦、何也、蓋以其神不以其貌也、賢人君子、伏處於草莽者衆矣、余不能盡識也、然豈因不識而遂置之乎、此余所夙夜不能忘者、夫畫蘭、其小焉者也、

算起，故宫博物院在民国期间只有两任院长，分别是易培基（任职时间为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和马衡（任职时间为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其中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一九

三四年五月七日这一时期为代理院长时期）。陈垣先生虽然没有故宫博物院院长头衔，但是其为故宫博物院的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对故宫事务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振导中国固有之文化——易培基**  
易培基（一八八〇年~一九三七年），字寅邨，号鹿山，湖南长沙人，教育家，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任院长时期是故宫博物院民国出版的黄金时代。



《明下文瑜摹古山水》内页

易培基是个具有强烈文化使命感的人。清宫文物、典籍收藏是中国古代文物、文献收藏的集大成者，具有垄断性、封闭性。易培基等率领故宫员工，以展览、出版的方式，公开宫廷秘藏，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在《故宫周刊》「弁言」中，易培基谓：「吾国为数千年文明古国，文艺进化，震铄世界，徒以封闭之习过深，凡属文艺之精奥，大都私于一姓，匿不示人。」

为了打破这种状况，故宫对公众开放后，「同人犹虑传播之不广，遂有拓印古器影印书籍字画之举，最近复编有《故宫》月刊，皆所以为振导吾国固有之文化之助者也。」易培基在《故宫书画集》序言称出版《故宫书画集》「尽量介绍吾国书画艺术于世界，使一洗珍秘之习焉。尤此志也」。

易培基任职期间，故宫博物院构建了系统化的出版格局。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构建了完整的编纂、印刷、发行流程，总务处负责招商印刷、管理出版资金，秘书处、总务处、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均有编辑职责，故宫印刷所负责印刷，出版物发售室（发行所）负责销售。为了统筹出版事业，当时还成立过专司出版的临时机构——出版处；其次，构建了完

整、互补的出版物体系。以刊物为例，首先创办《故宫》（月刊），后考虑到月刊的成本较高，发售价格不低，不能达到普及于一般民众的目的，于是又创办了《故宫周刊》，这两种刊物出版后，编印《故宫书画集》，介绍故宫藏书画艺术佳作，「以补上述两刊之不足」。经过努力，故宫出版的书画、谱录、目录、影印典籍、铅印典籍、史料、论著等各类出版物构成了品类丰富而内容、类型互补的出版物体系。

### 增砖添瓦——马衡

马衡（一八八一年—一九五五年），字叔平，浙江鄞县人，金石学家、书法篆刻家，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任职之时，故宫博物院精华文物刚南迁不久，他尽力维持了易培基院长任上留下的出版格局，《故宫》（月刊）、《故宫周刊》等刊物仍照常发行，书画影印、文献及图书编目成就可圈可点。马衡先生还在金石学等专业领域，为故宫出版添砖加瓦，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撰写了论文《新嘉量考释》，为《避暑山庄藏汉铜印》《毓庆宫藏汉铜印》两印谱撰写识语，并参与《金薤留珍》等印谱的拓印工作。

## 故宫出版的组织者们

陈垣、易培基、马衡等领导者是从宏观角度把握故宫出版事业的整体方向，而负责出版事业的谋划与运营的是故宫博物院中层事务领导，包括李宗侗、吴瀛、沈兼士、俞同奎、张庭济，以及故宫博物院各馆处历任正副馆（处）长。

### 故宫出版格局的宏观规划者

#### ——李宗侗与吴瀛

李宗侗（一八九五年—一九七四年），字玄伯，河北高阳人，曾任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常务委员、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等职。李宗侗对故宫出版事业的贡献在于宏观规划。李宗侗在《故宫》（月刊）序言中，期望通过印刷品，达到「故



李宗侗（一八九五年—一九七四年）

# 故宮週刊

培基



本院理事兼古物館副館長馬叔平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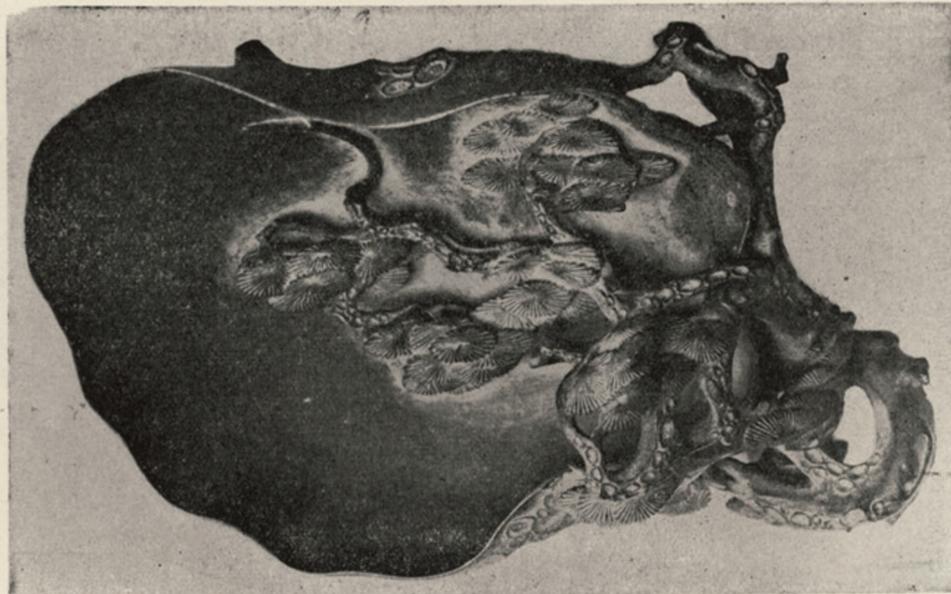
清代外交史料拾遺 (續)

(一)道光朝及其交涉史料  
張井奏署內並屬官並無買食鴉片由

內閣奉上諭刑部復議給事中劉光三奏請酌加食鴉片烟罪名等情、嚴定條款具奏、著照所議、嗣後軍民人等買食鴉片烟者、杖一百、枷號兩個月、仍令指出販賣之人、查拿治罪、如不將販賣之人指出、即將食烟之人照販賣為從例杖一百、徒三年、職官及在官人役買食者、俱加一等治罪、仍令各該督撫及地方道府州縣等官出具署內並無買食鴉片烟各甘結、於年終彙奏一次、如本官徇隱不究、從嚴參處該部即移咨吏兵部二查照辦理、並通行各直省督撫一體遵照、欽此、咨行遵照在案、伏查鴉片烟害比砒鴆、流毒最劇、臣於署中家屬幕友及長隨書役人等無不隨時嚴查、又念署中為耳目所及之地、防檢易周、其餘所屬文武官員或舊染未能痛除、或隱匿不肯究治、均難保其必無、現復細加偵查、尚無此等情弊、此後更當明察暗訪、務絕

三品頂戴江  
南河道總督  
臣張井跪奏  
為署內並所  
屬各官現在  
並無買食鴉  
片烟年終遵  
例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  
照本年六月

竹根雕松樹水盛



西清硯譜摹繪宋硯之一



宋文、以期仰副聖主整飭風俗人心之至意、現屆宣年終除特將所屬文武應出甘結咨核辦外、所有臣署內並無買食鴉片烟、理合據實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未完)





清日五十月十年四十國民華中



吴瀛（二八九一年—一九五九年）

「官藏品庶几家知户晓，其于文化史裨益」的效果，为此，他与秘书吴瀛等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想有一个十年或五年的计划，将所有本院文物完全摄制了副本流传，做一个既可普及又便保存稽考之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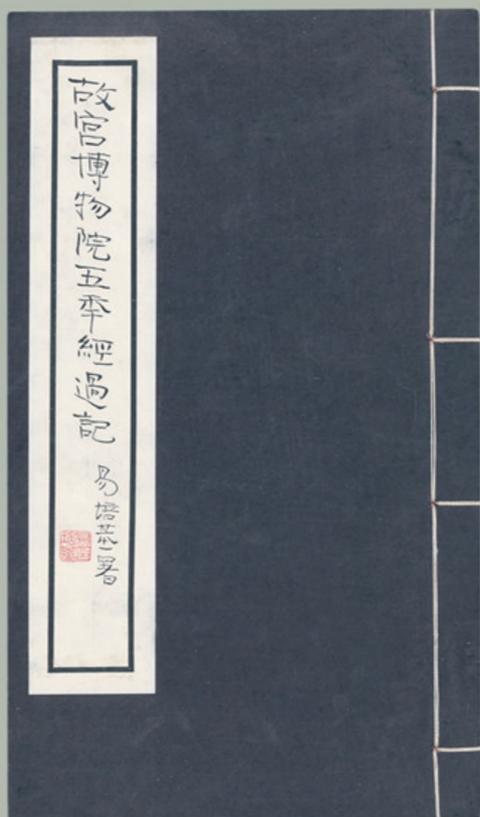
（吴瀛《故宫生梦录》，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一六九页）此外，李宗侗还重视故宫出版物对国家事务的价值，他希望出版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编好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并继续编辑出版道光以前以及光绪、宣统两朝的外交史料，「其于不平等条约之废除，或者不无小补」。〔李宗侗《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校印后记」，（清）文庆等编《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故宫博物院影印，一九二九年〕

吴瀛（二八九一年—一九五九年），字景洲，



清室善後委員會同人攝影

《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内页之“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同人摄影”



吴瀛编著、易培基题写书名的《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封面

江苏武进人，清末入湖北方言学堂，后在北京政府任职。一九二四年受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参加清点故宫文物，后任故宫博物院秘书，古物陈列所接收委员。曾任《故宫周刊》创刊主编，著作有《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等。

吴瀛与李宗侗一起规划了故宫出版格局，并领导了专司出版的故宫博物院非正式机构——出版处。出版处不见于故宫的正式出版物及历年工作报告，但故宫博物院档案室保存了出版处的相关档案。故宫博物院档案记载：一九三二年五月四日，秘书、出版两处共同制定《改组发售室试

# 故宮週刊

培基

藍泰景藏庫小殿凝端



六之器瓷軒月古



敬事房存查、再敬事房自鳴鐘二處、俱有存用銀兩、須用天平兌准、爾等現在先將各該處隨來開列物件查明、再進宮內清查。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總管內務府大臣奏、為遵旨查得內廷一應庫務、編等歸類收發封鎖等項章程、業經三和、倭赫奏准在案、應令該庫總管太監人等遵照辦理、惟查庫務檔案、俱應蓋用騎縫印信、請令總管太監酌量一年足用張數、釘簿送內務府、遂張鈐用廣儲司印信、存貯該庫、凡有收發錢糧什物等項、俱令即時登記印檔、不惟易於稽查、且杜絕遺失之弊等因具奏、奉旨依議。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本月十九日、奏事總管王常貴、太監秦祿、高昇、將雲貴總督愛必達、山東巡撫阿爾泰、奏匣外信封、互相舛錯發去、將王常貴等交總管治罪、隨經總管劉玉等奏稱、查例凡宮殿監接奉上諭具奏事件、有不敬謹詳明、以致舛錯者、罰一年月銀、今秦祿等包發奏匣舛錯、總管王常貴失於查對、應各罰一年月銀等因具奏、奉旨依議。

(未完)

生先士兼沈長館副館獻文兼事理院本



奏、交  
養心殿  
存查、  
養心殿  
所司官  
物陳設  
、向亦  
無查核  
、亦著  
年終具

### 清宮史訓諭選錄(續)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總管王常貴倉州王成李裕、首領張玉程斌等奉上諭敬事房所司官物錢糧、向無查核、嗣後俱著年終具奏、交養心殿存查、養心殿所司官物陳設、向亦無查核、亦著年終具奏。



類紙聞新為認號掛准特局務郵華中

行办法》，秘书长李宗侗及秘书吴瀛分别签字。据此可以推测，出版处的领导者应是吴瀛。吴瀛还参与了故宫印刷所的组建工作，主导了官营的出版物发售室转化为官商合营的出版物发行所的工作。

### 故宫明清档案管理的先行者

#### ——沈兼士

沈兼士（一八八七年—一九四七年），名馥，一名馥士，坚士，笔名兼士，浙江吴兴（今湖州）人，语言文字学家，明清档案专家。

曾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主持文献部工作），文献馆副馆长、馆长。沈兼士曾组织编辑出版《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清代文字狱档》等三十余种书刊。任文献馆馆长时，他对清代档案

《故宫周刊》一九三〇年第二十三期上刊载的沈兼士先生小影

# 故宮週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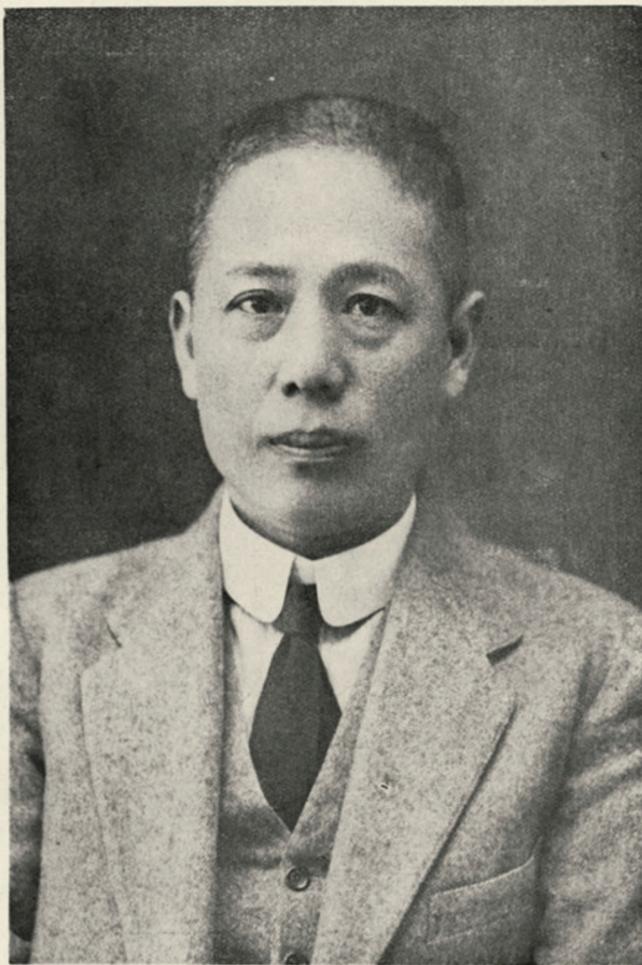


培基

像王天繡清



生先樞星俞長處務總兼事理院本



、用柴草燒灰拌土培養根苗、并防蟲患、至三四月花落結包、用竹刀劃破、刮取白漿、焙乾候轉黑色、用銅鍋和酒煎熬成膏、即充鴉片膏、查得道光元年温州永嘉縣之南谿、樂清縣之西城堡、平陽縣之湖裏、麻洋、台州、黃巖縣之路橋、烏巖、等處、俱有栽種、仙居縣尤多、經地方官查知拔毀通票、經司核議、照荒蕪田地例計分科罪、因所議太輕、近年來復有冒禁栽種者、維時在中秋以前、尚未下種、無從踴勸、伏查種植須及半年、既非成于旦夕、開禁在于曠野、又難掩于見聞、地方官果能實力巡查、禁之甚易、當即沿途面諭各府縣先行剖明利害、剴切曉諭、給示嚴禁、仍於春初親履各鄉、查驗拔除、嚴加治罪、自可不留遺種、(接第二版)

清代外交史料拾遺(續前)  
(一)道光朝禁煙及其交涉史料  
孫爾準原擬章程 (續)  
伏查鴉片煙產自外洋、皆由奸商夾帶流入內地、最為風俗人心之害、道光三年間、吏兵二部議定條例、奸民私種罌粟、煎熬煙膏、地方官自行拿獲免議、其得規故縱者、革職、失於覺查、按其煙斤多寡分別處分武職畫一辦理、奏奉諭旨通飭欽遵嚴行禁止、此次臣孫爾準赴浙道出溫台、遣人到處密訪、其法於八月間佈種



的整理制订了较为细密的计划，并开始对

档案整理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编写《整

理档案规程》，撰写文章《文献馆整理档

案报告》，对明清档案管理和档案学做出

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

## 故宫出版印刷的确保者

### 俞同奎与张庭济

故宫出版物在经过编纂之后，由总务

处负责故宫博物院全院出版经费管理、招

商印刷等行政事务，总务处长俞同奎、张

庭济对故宫出版出力甚多。

俞同奎（一八七六年—一九六二年），字

星枢，浙江德清人。历任故宫博物院维持

会常务委员、管理委员会干事、故宫博物

院理事、总务处长。一九三〇年二月，李

《故宫周刊》一九三〇年第二十六期上刊载的俞同奎先生小影

右周文矩子達採神圖曾入紹興內府前  
 有紹興題識印款傳彩溫潤人物古雅  
 信為一種珍玩子達舍曹氏無其人但未  
 詳採神為何義當必有說以俟知者  
 大德八年春二月十四日吳興趙孟頫子昂



《赵孟頫集册》封面及内页

宗侗在《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校印后记」中谓该书出版「至于董理印

刷局之交涉，总务处长俞星枢先生之用力

居多」。此外，据吴瀛先生回忆，俞同奎

还是《故宫》（月刊）创刊主编。

张庭济（一八九五年—一九五八年），字

柱中，号柳西，九龙山人，浙江平湖人，

曾任故宫博物院秘书、总务处长。七七事

变后，北平沦陷，马衡院长及院内一些主

要人员大部分离开北平，或南下或转往他

处，张庭济以处长的身份，奉命留守，在

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苦撑了八年。在

此期间，他努力维持原有的工作规划，并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进故宫的工作。沦

陷期间，北平故宫博物院仍出版了《赵孟頫集册》《清宫述闻》等出版物，张庭济筹集经费、组织出版可谓功不可没。

### 故宫出版的编著者们

故宫博物院出版物的编著者群体，大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院外的社会名流和

故宫博物院聘请的院外专门委员，一类为故宫博物院员工，以当时的年轻员工为主体。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出版物，无论

是编纂的刊物和书籍，还是影印的史籍及书画作品，其整理、编辑、拍摄工作本为

故宫博物院员工的职务行为，加之这些出

出版物多为集体劳动成果，因此署名多为「故

宫博物院」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故

宫博物院古物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鲜见个人署名。即便如此，延请的院外专

门委员以及部分院内员工还是在一定程度

上获得了署名权。故宫出版物的署名分为

两种类型：一种是作为编纂者署名，主要

是故宫博物院出版的谱录、目录、影印典籍、

铅印典籍、史料等，以间接署名方式为主，

如专门委员张允亮编纂《故宫善本书目》，

淮海居士长短句上



秦觀 少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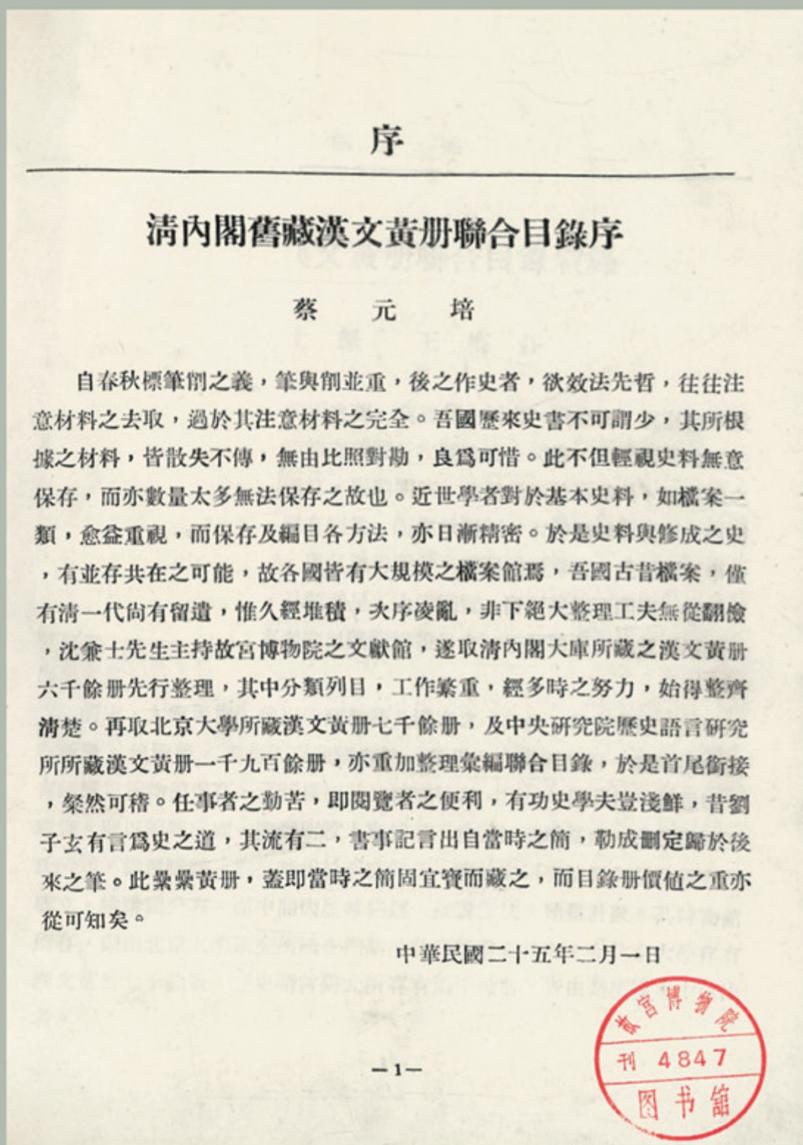
望海潮四首

星分牛斗疆連淮海揚州萬井提封花發路香鶯啼人  
起珠簾十里東風豪俊氣如虹曳照春金紫飛蓋相從  
巷入垂楊畫橋南北翠烟中

追思故國繁雄有迷樓掛斗月觀橫空紋錦製帆明珠  
濺雨寧論爵馬魚龍往事逐孤鴻但亂雲流水縈帶離  
宮最好揮毫萬字一飲拚千鍾

其二

《淮海居士长短句》内页



《清内閣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封面及序言页

其识语云：「允亮自知固蔽舛谬，不免要以此为权舆，而待他日理董云耳。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张允亮识。」以自序的方式点明编纂者，一种是作者直接署名，含各种书的题跋，或发表于故宫博物院民国时期出版的论文集（《文献论丛——沈兼士先生纪念刊》等）上的论文。此外还可以通过出版之后的访谈、纪念性文章，了解某些出版物的编纂者姓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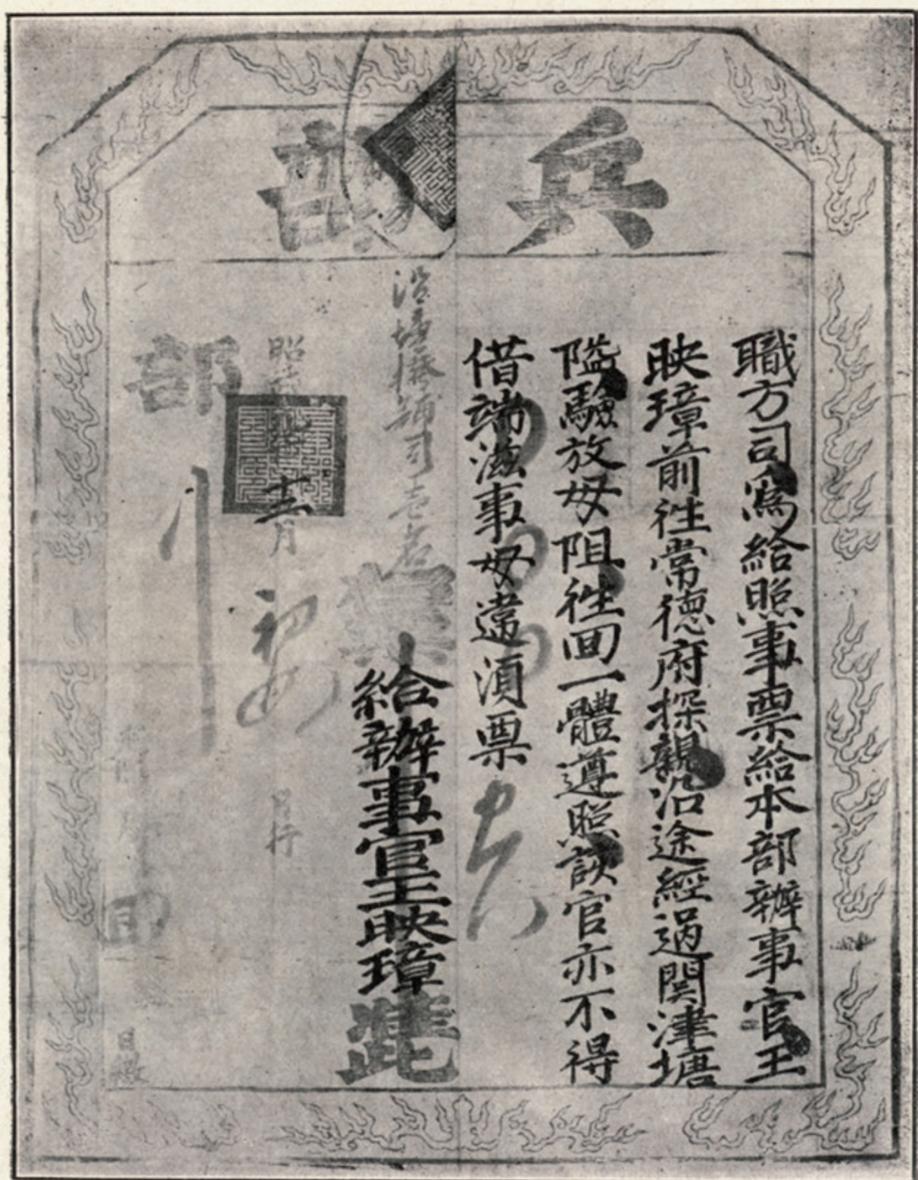
### 由知名学者组成的专门委员编著者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成立了学术机构专门委员会，多次聘请社会知名学者以及故宫博物院各馆处正副首长担任专门委员，部分院外专门委员，如张允亮、陶湘、赵万里、齐如山、孟森、余嘉锡等参与了出版物编辑或题跋撰写工作。

张允亮（一八八九年—一九五二年），字庾楼，别号无咎，河北丰润人，藏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古物陈列所副所长，他为故宫编纂了《故宫善本书目》和《故宫善本书影》。

陶湘（一八七一年—一九四〇年），字兰泉，号涉园，民国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江苏武进人，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曾编

吳 三 桂 兵 部 照



長 70 c. m. 寬 53 c. m.

纂《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傅增湘在題詞中道盡了陶湘編該書的辛苦：「凌晨而屆，日昃而出，時而飢疲。」

趙万里（一九〇五—一九八〇年），字斐云，名宗康，字如山，河北高陽人，戏曲理论家，曾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他為故宮博物院影印善本古籍《淮海居士長短句》《太平清調伽陵音一卷》撰寫了跋語，考證版本源流。

齊如山（一八七五年—一九六二年），原平署岔曲，撰寫序言，述岔曲的特點，以及故宮博物院所藏《升平署岔曲》的史料

价值。他还为故宫博物院论文集撰写了论文《由承应戏可考国剧之来源》。

孟森（一八六九年~一九三七年），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清史学科奠基人，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孟森为《清官述闻》撰写了序言，还为故宫博物院出版的论文集撰写了论文《清太祖起兵为父祖复杂事详考》等。

为故宫博物院系列论文集撰写论文以及序跋的专门委员还有余嘉锡（《书册制度补考》与《碎金跋》）、蒋廷黻（《欧洲几个档案库》）、姚从吾（《档案馆与现代历史学的关系》）、福开森（《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吴廷燮（《论清光绪时之财政》与《库伦方輿纪要序》）、朱希祖（《抚畿疏草跋附张凤翔列传考证》）、顾颉刚（《禹贡学会的清季档案》）、王之相（《中俄陆路通商关系之历史上变迁》与《一个具有文学和经济意义的俄文文件的释义》）、启功（《跋邳河伊拉里氏跳神典礼》）、王重民（《述美国国立档案馆》）等。

作为社会名流，曾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蔡元培先生为《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撰写过序言。撰写过论文的知名学者还有刘厚滋（《纪明清官史纂印事》）、刘文兴（《杭世骏厉鹗博学鸿词科试卷跋》）等。

### 故宫博物院的员工编著者们

故宫下属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秘书处、总务处员工都参与了编著工作。朱家潜先生回忆，陈垣先生认为学术界需要故宫博物院加速公布资料，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近水楼台利用资料写出有价值的文章，当然会受到社会上的欢迎，但更迫切需要的是前者。因此，故宫博物院员工的编著工作以编辑为主，著述为辅。著述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书画、史料等出版物撰写说明、叙录，另一种是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等论文集撰写论文。这其中的佼佼者有单士元、单士魁等人。

单士元（一九〇七年~一九九八年），字君实，北京人，档案学家、明清史专家和古建筑学家。一九二五年一月，单士元先生随文学院教授沈兼士等先生进清室善后委员会参与点查文物。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他赍续在院任职，解放后曾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先生主持、参与编辑了《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史料旬刊》《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等刊物，撰写了论文《清代档案释名发凡》等。

单士魁（一九〇五年~一九八六年），字秉彝，北京人，明清档案专家，清史专家，

一九二五年二月入职，曾任故宫博物院科员等职。主持、参与编辑了《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清内阁汉文黄册联合目录》《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清内阁库贮旧档集刊》《清三藩史料》，撰写了《清代黄册与赋役问题》等论文，并与王梅庄合著《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叙录。

张德泽（一九〇五年~一九九八年），字洵如，河北东光人，明清档案专家、清史专家，一九二五年一月入职，曾在故宫博物院总务处、文献馆任职，主持、参与编辑了《清代外交史料》《清季各国照会目录》《清季教案史料》等书，还协助单士元先生编成《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撰写《军机处及其档案》等论文。

单士元（一九〇七年~一九九八年）





庄严（一八九九年～一九八〇年）



那志良（一九〇八年～一九九八年）

冯华，字大光，河北故城人，一九三〇年三月入职，曾任故宫博物院书记，参与编辑《故宫周刊》《故宫月刊》《故宫书画集》《故宫日历》等，还参与了故宫印行的法书名画的单行本的说明文字编写工作。

黄鹏宵，字鹏笑，广东新会人，一九二五年四月入职，曾任故宫博物院科长、出版物发行所主任，编纂《故宫清钱谱》，并撰写叙录。

此外，编著有出版物的故宫博物院员工及其著作还有：何澄一（一九二九年九月入职，曾任科长）编《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

曹宗儒（一九三二年九月入职，曾任书记员）撰

论文《总管内务府考略》，吴志勤（一九二五年五月入职，曾任办事员）撰论文《升平署之沿革》等等。

## 故宫出版的传拓与印刷者们

### 故宫出版的传拓

出版物编纂好之后，就进入了印刷环节，在故宫博物院刚成立初期，就有特殊的印刷方式——传拓。一九二五年古物馆成立时，设立了流传课，其职能是传拓、售卖青铜器、铜印、玺印、砚铭、刻石等，

故宫所藏的重要铜器如散氏盘、嘉量、宗周钟、曾伯猗壶、颂鼎、大鼎等一百余种文物的器形、铭文，都传拓后单独发售。而铜印、玺印则集结成册发售，如《金薤留珍》《毓庆宫藏汉铜印》《避暑山庄藏汉铜印》等。

传拓工作由古物馆员工担任，传拓印品中，最负盛名的是《金薤留珍》印谱，由王禔、唐源邨（醉石）、马衡、吴瀛铃拓，周白吾、齐念衡、庄严、马权襄助（庄蕴宽《金薤留珍》「序」，故宫博物院传拓，一九二六年八月），那志良、吴玉璋担任编目工作（那志良《故宫四十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〇年，第二四页）。

八月十八日到  
九八五

大英欽差大臣伯爵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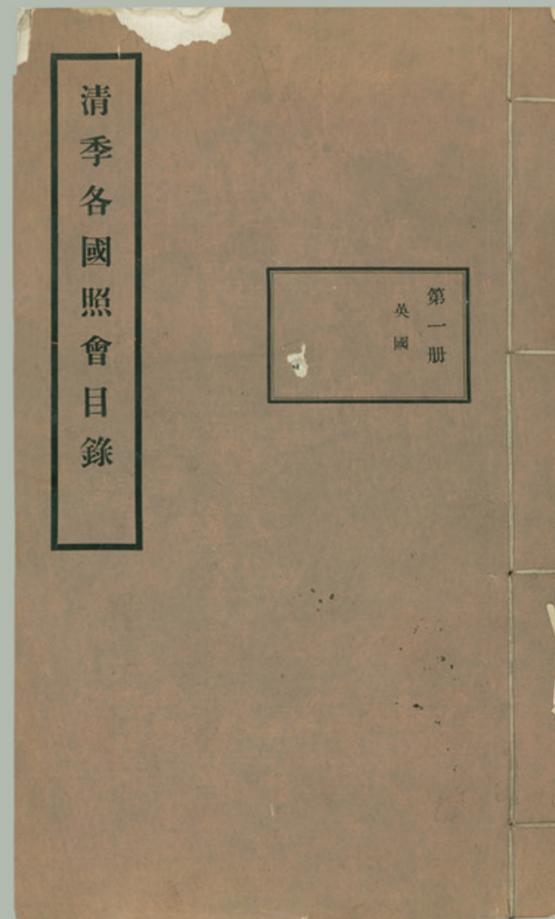
照覆事接准十七日

貴親王來文閱悉因查十六日照會內以  
續約蓋印畫押並將違理留京英國員  
人送回等情往來行文數件仍未結局



為

英 欽 差 額 爾



清季各  
國照會  
目錄  
第一冊

之處當經咨會我

大將軍克 查照在案我軍茲已啟程

進京在道數里惟本大臣必要各節業

經先後詳晰備文陳明

貴國自不得不深達其實一定不移果

願復和務宜刻即簡派真堪預辦照

議各等事宜之委員一面送回該員人等

偕至該處軍前為要為此照覆須至照

會者

右 照 會

大清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

一千八百五十年十月  
 庚申年八月十八日  
 初二日

會 照 約 續 理 辦 員 派 即 請 金 爾

《清季各国照会目录·第一册·英国》封面及内页

## 官商合营的故宫印刷

易培基担任院长后，因承印故宫出版物的院外机构的印刷质量不能令故宫完全满意，故宫谋划组建了官商合营的故宫印刷所，其核心人物是杨心德。

杨心德，别字新德，上海人，曾在柏林工业大学研究光学化学，毕业后在《柏林画报》研究制版，后应邀来故宫博物院担任摄影技师。一九三一年春，杨心德打算辞职专办私人印刷工厂。故宫「为流传文化起见，需要精良印品」，于是提议与杨心德合作，试办印刷厂。一九三二年故宫与杨心德等订立官商合办契约，故宫印刷所正式成立，官方（故宫博物院）与商方（杨心德等合伙人）各占一半股份，杨心德兼任技师、经理，用人行政，故宫都不干涉。一九三三年，故宫投入增量资金，股份增加了一倍。

但故宫印刷所一九三一年试运营时，经理还不是杨心德，而是一王姓人士。一九三六年在厘清院方与所方历年欠账的《印刷所悬案解决办法》第二条：「二七期《故宫》月刊改用江南粉连纸。查古物馆卷前事，并未同意（原函抄附）。至每张签『付印』字样自系指版样，并非指纸样。」

王经理之同意仅能认为所方意思，不能代表院方，故是项损失计六百元，院方不能负责。」查《故宫》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创刊，第二十七期的出版时间应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可知此时故宫印刷所的官商契约尚未签订，其经理姓王。

杨心德的经理任期并不长，不超过两年的时间。一九三四年八月，审计署审计故宫印刷所账目时，对「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王士铎兼印刷所经理」这一安排表示质疑，因为涉嫌违反公职人员不能兼职兼薪的规定，故宫致审计署回函谓：「查故宫印刷所自经理庄文亚辞职后，一时无适当人选继任，而所务又未便久悬，且正在清理改组期间，爰由该所董事会决议，请该所董事王士铎暂时前往照料。」（《审计部函五项事由从速签订故宫印刷所正式合同由》，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

从这条材料可知，当时由王士铎担任故宫印刷所代理经理，杨心德已经从经理任上离职，后任经理庄文亚也离职，但尚不能确定庄文亚与杨心德之间是否还有其他人任过经理一职。

工程毕业生，著作有《全国文化机关一览》《全国图书馆调查表》等。遗憾的是，庄文亚担任故宫印刷所经理的经过不详。

王士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故宫出版物的印刷业务本由总务处管理，因此他担任故宫印刷所的代理经理是情理之中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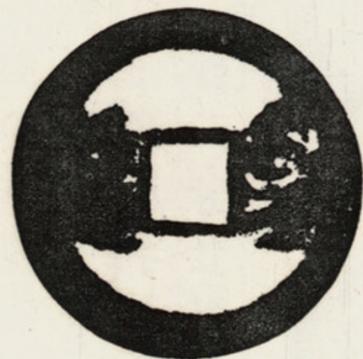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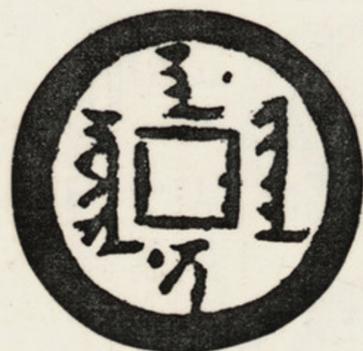
## 故宫出版的发行者们

故宫刊物印刷出来后，由总务处定价，铃盖版权章，然后交由出版物发售室售（发行所）售卖。

吴瀛先生在刊物发售环节，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发售室在一九二七年成立。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公布《出版物发售室简章》，其中第一条规定：「本院暂设出版物发售室经理各项出版物之发售事宜，隶属于总务股。」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出版物发售室改组，分为了文书部、会计部、发售部、订购部。一九三二年，由于故宫博物院出版事业蒸蒸日上，出版物发售室的流水量金额变大，在秘书、出版处负责人吴瀛

故宮清錢譜

天聰之寶



面文爲滿文，左「天聰」，右「之寶」。蘇勒  
聰明也。上「天」音汗，皇帝也。下  
「之」音呢之也。右「齊」音齋，哈錢  
也。自左讀之，文曰「天聰之錢」。  
即天聰之寶。背文亦滿文，左「汗」  
音專，十也。右「齊」音額穆，一也。  
「齊」音烟，兩也。即值十重一兩  
原錢背文漫漶。



太宗天聰元年

清通志食貨志載

鑄錢二品，右錢乃當十大錢。

其文字爲開國以前之老滿文

無圖

考天聰元年即明

熹宗天啓七年背文紀值兼紀重蓋仿天啓當十錢之

形制

錢譜

一

*Sura han ni shiba*

See Bushell *NCDA*, 25, 2,  
XV p. 196, also *China Review*  
VI p. 143.

《故宮清錢譜》內頁

的操办下，为了减轻院款负担，决定发售室从出版物销售款中提成作为开支，而不再由故宫博物院拨经费。一九三二年五月四日，由秘书、出版处呈送的《改组发售室试行办法》得到院长易培基的批准，发售室改名发行所，由故宫的官办机构转变为官商合营机构，故宫职员调回本院，服务人员完全改用店伙，每月提成销

售额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开支。但在抗战期间，因出版物销量缩小，发行所的销售提成无法维持运营，又改回了官办的发售室，职员再次由总务处员工兼任。一九四八年《本院总务处办事细则》第五科办事细则规定：「本科所属出版物发售室除出纳由第三科调派外，其主任由第三股主任兼任，业务人员由该股职员兼任。」

根据现存文献，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上述先贤对故宫出版事业的贡献，但由于时间久远，其他故宫博物院员工在其中所起作用已不甚了了，但他们所构成的致力于出版事业的故宫先贤群体，其价值和贡献是永不磨灭的。（本文所配书影图片俱为故

官博物院图书馆藏）

